

洗夫人文化研究

史话佳作 精彩引人

——吴兆奇研究专著《洗夫人文化史话》述评

何火权

吴兆奇是茂名文化名人，茂名市洗夫人研究会副会长，我市文化界习惯称他“吴老”，既是敬称，更是对他在茂名文化界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市作协主席张慧谋在一篇文章中说，“吴老是文人，大文人，在茂名，人称文化泰斗，一点不虛，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泰斗。他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洗夫人，编撰洗夫人史料百余万字。”吴老与白雄奋、李爵勤编撰了《洗夫人文化全书》(一、二卷)，又合著出版了《洗夫人文化》，在茂名文化研究界，吴老的成就和贡献，那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近读吴老的研究专著《洗夫人文化史话》，这是研究洗夫人、宣传洗夫人文化的一种最新表述形式，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展现了1400多年前茂名古代史上划时代英雄洗夫人的方方面面，这是吴老把几十年来对洗夫人文化的研究成果，用生动的文笔展现出来。所以说吧，这是一本最全面、最客观而又最生动宣传洗夫人文化的精品佳作，其最大特点就是把“史”与“话”相结合，既重视史实的研究，又讲究文章的铺排渲染，生动形象，精彩引人。

一、重在写“史”，搜集依据史料丰富翔实，体现洗夫人文化研究的心血结晶

吴老在开篇的引子中说，“《洗夫人文化史话》，说的是洗夫人文化的历史之话。既然是史话，就该有史有话；话中有史，史里有话。”这样说来，“史”和“话”本是无法分开的，只是为了便于探究，我把其“史”与“话”分开来点评论述。在“史”方面侧重的是以史为据，重在考证和论据充分，做到“有史引史，有志引志，是相传说相传，不作毫无根据的臆断。”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研究洗夫人文化非常重要且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对已有的洗夫人文化研究成果，不再是简单的现象罗列，而是做深入的系统研究，深入研究看到本质。吴老以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独特的表达形式，这在本书的各章都有体现，在第一章“洗太文化耀华夏”，第二章“巾帼英雄第一人”尤为突出。比如对洗夫人文化是怎样来的，包涵了哪些内容，有哪些基本特征？先作概括介绍。吴老充分运用研究成果，写出了“一条绚丽的洗夫人文化链”，包括史书、笔记、年谱、碑记、立庙以祀的民俗以及遗址、文物、考古资料等，在书中把重要的历史资料作系统介绍，这便于读者了解洗夫人文化的形成有着厚实的基础。认为洗夫人文化的形成、成熟、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接着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历史孕育了洗夫人文化，其本人也是不断在创造历史，不断创造内涵非常丰富的洗夫人文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洗夫人给后代留下的辉煌的洗夫人文化遗产，也越来越丰富。”通过列举史实进行分析，吴老认为“洗夫人功业之伟大先决于她的精神之伟大”。紧接着写洗夫人精神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爱国统一精神，爱护人民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改造社会精神。通过分析洗夫人精神，把洗夫人

生平事迹、主要功业作简要介绍。如写洗夫人的爱国统一精神，就写了洗夫人“请置崖州”，智破李迁任、两次平乱、率众归隋等，突出洗夫人“把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和追求，言必信，行必果，为之奋斗终生，这就是她爱国统一精神思想的基础。”

引用大量的正史、地方志、笔记等资料，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有史引史，有志引志，是相传说相传，相当客观真实。如在“百战金戈向日开”这一章，主要写洗夫人运筹帷幄，平定叛乱，引用了《隋书》《北史》和《资治通鉴》等正史的记载，同时据史实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对洗夫人平定王仲宣、陈佛智的叛乱，从背景入手分析产生叛乱的原因，对平乱的过程作详细交代，肯定平乱的意义，“隋朝在岭南甚至江南的政权得以巩固，一些当时进步的改革得以推行，岭南又重新安定下来，人民又可安居乐业了。”书中引用的地方志、笔记资料，如《广东通志》《高州府志》《电白县志》和《广州人物传》及一些名家的笔记等比比皆是。如引用曹志遇主修的《高州府志》的相关内容来表达洗夫人改造官僚社会的影响，“当陈、隋之时而无洗氏者，高凉非中国；有高凉而无洗氏者，则魁结跣足之俗未必解辫发而袭冠裳也。”就是对洗夫人故里的论述，也相当客观真实，并没有辟出专章来单独讲，而是放在相关章节里，如在尾声部分，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张德江在中共广东省委九届四次会上的讲话，明确“洗夫人出生于电白”；借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写给张德江书记的信，说出“洗太夫人……出生于古高凉今电白山兜丁村”。通过引述领导人和名家的说法，既客观又有说服力。

最客观真实、最有特色和最可信的史料，是引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选载了其中的考古报告。如在“英雄何处觅归魂”这一章中，为了说清楚洗夫人长眠何方，引用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非常多。如两广总督阮元组织重修《广东通志》，派出从事编修工作的山西人仅克中来调查，仅克中通过调查采访，确认洗夫人墓在电白县山兜，并题诗纪实。除引述历代地方志来证明外，还引用《广东新语》《粤中见闻》和《太平寰宇记》等史料来佐证。而最有价值的是五组考古资料，特别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白山兜洗夫人墓第二期考古工作，取得震撼人心的成果”这篇勘查工作报告，以确凿的证据，充分证明山兜洗夫人墓确定无疑，“终于让各种志书尤其是考古科学画上了庄严的句号。”

二、把握“话”，铺陈叙事文笔生动优美，开拓洗夫人文化研究的崭新表达形式

对洗夫人文化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者所用的史料来源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正史、地方志以及一些笔记类的记述。材料虽然差别不大，但在写作手法上大不相同，加上大多数是以考证议论为主，这样在生动性、可读性方面就大打折扣。如何把深奥的内容通俗化，把历史事件讲得有

趣引人，这便要看看作者的文学功底和叙事能力。吴老的这本“史话”在表达形式上的创新，就是“纳其要者，稍事修饰铺陈，在必要的地方演叙一番，使之顺理成章，精彩可读”，这是该书与其他研究专著最大的不同，也是其最大的特色。

铺陈渲染，让史实变活，演绎得更生动、更引人，在本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学术研究活动一般是比较枯燥的，但吴老把自1983年以来的三次重要学术活动写活了，称1983年12月举办的“洗夫人研究学术交流会”，2001年5月的“首届中国边境城市文化经贸旅游艺术节”期间举办的“洗夫人文化研讨会”，2005年1月召开的“洗夫人文化与研究广东文化大省学术研讨会”，这三次学术研究活动是“三个里程碑”，并对取得的研究成果，用诗一般的语言进行概括，“请仔细观摩这巍峨殿堂的雕梁画栋，珠玑宝顶，堆砌着千年的文化积淀，演绎着洗夫人文化的不朽盛事”，比喻形象生动。写冯宝的先祖冯业浮海归来，充满文学色彩，“一支伍卒不整的船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离开古高丽国的海岸，迎着黄海的汹涌波涛，向着中国大陆急速地行进。”“旗船上站着一位身材伟岸、面带愁容的汉子，他正在督促着手下加速行驶。”这些语句既有情景描写、人物描写、行动描写，还设置悬念，吸引读者，读得很想知悉，这船队是些什么人？领航者又是谁？后面交代，原来这位领头人便是北燕王朝的后裔冯业。用“史话”的形式来写，写作手法就比较灵活，可以铺排渲染、在史实的基础上生枝插叶，把简单的内容写得丰富多彩。写洗夫人率众归隋的“仓皇陈唐主，慷慨纳隋师”一节中，对洗夫人率众首领恸哭，写了感人的一幕，“广场的高丘上竖起两面大旗，一面飘着一个‘陈’字，一面飘着一个‘洗’字。洗夫人站在大旗之下，对着数千首领，说着陈朝的兴亡，说着隋朝的大统一，说到最动感情的时候，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引起了几千首领的共鸣，广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哭声，整整哭了一天。”这是在正史记载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演绎铺排，有场景、有动作、有故事，写得生动感人。这便是“史话”的独特之处，也是“史话”吸引人阅读的地方。

引用与洗夫人文化相关的史志资料，既可以丰富书中的内容，又可以让文章更生动，让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写洗夫人智破高州刺史李迁任，写侯景之乱，写洗夫人支持陈霸先，就把梁末侯景之乱作了比较多的介绍，把陈霸先建立陈朝的经过都提及，还引用了《陈书·高祖本纪》的内容来介绍陈霸先俭朴务实的作风，“常膳不过数品，私酿曲宴，皆凡品蚌蚶。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出洗夫人对陈朝开国的支持，“陈朝从极不稳定到逐渐稳定，洗夫人起了很大作用。”在“泪洒河山促一统”这一章中，引用史书记载的内容更多，有《陈书》《隋书》《资治通鉴》《南史》等史书的记载，全面分析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以及全国统一为大势所趋，这样为洗夫人率众归隋作了很好的交代和铺垫。

引用诗词和选用名家名人的文章、语句，为书中内容增色，又是这本“史话”的一大特点。在每一章的开篇，都有一首诗或名人名句，如写洗夫人的军事才能和平定叛乱这一章，就引用清代屈大均的诗句“三朝绣纛自天来，百战金戈向日开。保障谁如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作为开篇语就非常适当。又如写洗夫人智破高州刺史李迁任，引用了明代诗人李东阳的《古乐府·为谯国夫人作》，“刺史召，君勿行；妾不知兵，能知刺吏情。”在剑拔弩张的两军激战的文章内容中，插入一段适时适境的诗，可读性大为增强。

善于引用名人的论述或名篇佳句来说明作者的观点，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如为了论说洗夫人是公元6世纪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划时代大英雄，就引用了多位名人的评价，列举历史学家吴晗说的“洗夫人是我国越族的杰出人物”，民族学家陈凤贤说的“（洗夫人）为祖国的巩固统一和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以及社会学家张荣芳，炎黄文化学者欧初等的评价，既增强文章的说理力，又丰富文章内容。又如为了写山兜洗夫人墓遭遇的巨变，引用了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写得十分精彩的文章《腰斩的虫鼠》，虽然有些人对这场巨变有不同看法，但这是名家写的非常生动精彩的文章，自带光环，自带说服力。写洗夫人六世孙高力士，也是引用我市著名作家瑞流写的《宦官高力士其人其事》的相关内容，对高力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很有文学色彩的演绎，连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等带有演义的内容也写上来了，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生动性。

三、倾注着“情”，议论精到抒情清新自然，表达对洗夫人文化研究的深厚热爱之情

“史话”既有“史”，又有“话”，更由于运用这种比较灵活的叙事形式，便于抒发作者浓郁的感情。从字里行间，可以体悟到吴老对洗夫人的深沉赞美和深深的热爱之情；对洗夫人文化研究所倾注的孜孜以求的炽热之情。

在史话的开篇，吴老就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写了一首很有才情的词来做开章的引子。这首词饱含深情，“乱汹汹，谁拯金瓯裂？”赞美洗夫人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且看山兜原上月，静幽幽，今夜更清彻。”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情思，也突出了洗夫人故里的山兜，是对故里巾帼英雄洗夫人的深切呼唤和赞美。

运用议论抒情，在叙述洗夫人相关历史事件之后，来一句精到的议论或抒情，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引述吴晗等名家对洗夫人论述后，便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洗夫人是全中国唯一一位以毕生精力为国家统一、为岭南安定而奋斗的大英雄。”在详细叙述洗夫人带领众首领“仓皇哭陈主”一幕，有两处抒情，“这一哭，表现了洗夫人有仁有义，有情有理。”“她这一哭，扭转了整个岭南的形势，也决定着隋朝统一中国的大局。”这

些议论抒情的句子，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历史无情复有情”这一章中，分析了《赠广州大都督冯公神道碑》，述说冯君衡事件之后，有一段饱含深情的话，“今天，我们站在重新修葺的山兜娘娘庙的大门口，站在斜置着碑座的供亭边，站在相思树荫中肃穆庄严的墓碑下，站在考古发现的墓域献殿的遗址旁，不禁感慨万千！”这是对历史的咏叹，也是对洗夫人的深情怀念和赞美。

吴老对洗夫人文化研究倾注了深情，也花了相当多的功夫对相关碑记、铭文及相关记述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如对崔翼周撰写的《谯国夫人庙碑铭》专门用一章来进行逐段逐句的解读，称赞这篇《庙碑铭》，“可以说是前人一切歌颂洗夫人文章的代表作。”“他写出了英雄是神，神亦英雄。毫不夸张地说，《庙碑铭》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千古心声：英雄不死，洗夫人永在！”议论抒情恰到好处，给予这篇碑铭极高的评价。又如对流行于南盛一带的《洗太真经》，认为“其中思路清晰，文辞精炼，声韵铿锵，内容浩繁，不失为一本有水平、有影响的经文。”

在史话的尾声“留待来人谱新篇”，吴老写道，“临近尾声，笔者心头涌起一股激情，且拿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秋波媚》将这股激情消融、化解”，陆游的词中有“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瀟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等句子。吴老借陆游的词，抒发对洗夫人文化研究的真挚之情，后面用了一段排比句来反复咏叹，“洗夫人文化，等待着‘有人来’；洗夫人文化史话，等待着‘有人来’；洗学的构建等待着‘有人来’；庞大的洗夫人文化产业，等待着‘有人来’；壮观的洗夫人文化旅游产业，等待着‘有人来’！”这体现了吴老对洗夫人文化研究的殷切期待，反复呼唤，希望着后继有人，寄托着炽热之情。让读者体会到吴老对洗夫人文化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吴老以他在洗夫人文化几十年的研究功力和深厚娴熟的文学功底，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本集真实性、生动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洗夫人文化史话》。我认为这是让洗夫人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入厂矿基层，让广大群众阅读了解洗夫人，了解洗夫人文化的最好读本。吴老在洗夫人研究学术殿堂中取得的成果，跟他在书法、诗词、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一起，成为实至名归的茂名文化泰斗。他与白雄奋、李爵勤合著的《洗夫人文化全书》获茂名市人民政府2008—2010年度优秀社科(著作类)一等奖。2018年获广东省洗夫人文化研究基地颁发的首届洗夫人文化奖，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道：“洗夫人的风姿在他的字句之间跃然纸上。于他而言，那份崇敬之情系在心头，触笔生花，他早已扎根在洗夫人文化中。”用这份颁奖词来形容《洗夫人文化史话》体现出他的才情和影响也非常贴切，真是笔底生花，令人回味！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东省洗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洗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

爱生如子 严管厚爱

——论教育惩戒权的理性回归与温情实践

王如晓

教育是爱的艺术，也是规矩的传承。我这位从教四十载的退休教师深切体会到：没有惩戒的教育如同没有堤岸的河流，爱的滋养若缺乏必要的约束与引导，便难以汇入成才的海洋。所幸的是，202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这一政策举措不仅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更是对教师职责与学生成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笔者认为：爱生如子，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包容；维护惩戒权，也绝非对粗暴管教的纵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健康的教育生态。要使“严管厚爱”和谐统一，必须充分认识如下几方面的辩证关系，并加以好好实践。

一、爱的底色：教育惩戒的伦理基础与价值定位

“爱生如子”是中国教育传统中崇高的伦理准则。它要求教师以父母之心关怀学生，既包括生活上的照顾、情感上的支持，更意味着道德上的引导和行为上的规范。正如父母不会放任孩子走向歧途，教师也有责任对学生的不当行为进行及时纠正。这种纠正，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关

爱——它帮助学生建立边界意识、责任感和道德判断力。

然而，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惩戒权陷入“慎用”与“滥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过度强调“赏识教育”而忽视行为矫正，导致部分学生成长于缺乏约束的环境中，心理承受能力弱化，甚至形成“玻璃心”。教师因担心家长投诉、舆论压力或行政处分，往往选择“不敢管、不想管”，最终导致教育效能的下降。另一方面，极少数教师以体罚代替教育，违背教育规律，损害学生身心，玷污教师形象。这两种极端情形，皆因未能准确把握“爱”与“管”的辩证统一。

真正的教育惩戒，应以教育为目标、以关爱为底色。惩戒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教育的手段；不是对学生的否定，而是对其行为的规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明确将惩戒定义为“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矫治的行为”。这意味着，惩戒的出发点 and 归宿都应是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戒尺有度：教育惩戒权的规范实施与因人施教

教育惩戒权的有效行使，离不开科学的规范与艺术的把握。2020年教育部颁

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首次系统界定了一般惩戒、较重惩戒和严重惩戒的适用情形与程序要求，标志着教育惩戒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然而，文本的规定并不足以应对教育现场的复杂性。惩戒是否合理，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教育艺术问题。例如，“罚站一节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恰当的行为矫正方式，但对某些心理敏感或身体不适的学生而言，则可能构成身心伤害。因此，教师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年龄、性别、心理状态、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做到“因材施教”。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有教育热情，更要具备专业能力和人文关怀。惩戒的目的不在于“惩”，而在于“戒”——使学生认识到错误并愿意改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始终保持尊重和沟通，避免当众羞辱、语言暴力或过度惩罚，维护学生的自尊心与人格尊严。唯有如此，惩戒才能真正发挥教育功能，而不是沦为权力滥用。

三、机制保障：构建家校协同的教育惩戒纠纷解决体系

教育惩戒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社会共识与制度保障。近年来，多地试点设立“教育惩戒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学校法制

副校长、家长代表、法律及教育专家共同组成，旨在客观、公正地处理因惩戒行为引发的争议。这类机制不仅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也为教师依法管教提供了后盾支持。

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尤为关键。家庭是学生行为习惯和价值形成的第一现场，教师与家的教育理念是否一致，直接影响惩戒措施的效果。学校应通过家长会、家校沟通平台等渠道，主动解释教育惩戒的政策依据与实施方式，增强家长对教师专业行为的信任感。同时，也应建立畅通的申诉渠道，允许学生和家对不当惩戒提出异议，通过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解教师“惧用”权力、家长“过度维权”的矛盾困境，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家校共育环境。

四、师德为魂：以爱与责任引领教育惩戒的实践方向

最终，教育惩戒能否发挥正向作用，取决于教师的师德修养与专业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号召广大教师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以身作则，成

为学生品格、知识、思维和奉献精神的引路人。

“爱生如子”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伦理。它要求教师在施行惩戒时始终保持教育的初心：不是出于愤怒或控制，而是出于对学生成长的深切关怀。一名优秀的教师，应当善于在严格与宽容之间找到平衡，在规则与人性之间实现调和。唯有以爱为底色，以专业为支撑，教育惩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惩戒”，而不是“惩罚的教育”。

结语：严与爱的和谐统一

教育的本质，是以人育人、以心暖心。没有爱的惩戒是冷漠的，没有惩戒的爱是盲目的。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与弘扬“爱生如子”的传统精神并不矛盾，而是教育行为的一体两面。唯有在制度保障、专业实施和伦理关怀的共同支撑下，教育才能走出“不敢管”或“胡乱管”的困境，真正实现“严管与厚爱”的统一。

当我们把教鞭化为指引的灯塔，把戒尺变为测量的标尺，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滋润生命、塑造灵魂的伟大事业。而这，正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境界。